

汪暉：亞洲想像的政治（三）

四、現代歷史敘述中的亞洲：海洋與大陸、國家與網絡

當代知識界有關"亞洲"的討論是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條件下產生的。我在文章開頭提及了兩種"帝國"話語：第一種是以美國為中心的、以諸如世界銀行、WTO、IMF 等全球性組織為機制的全球性帝國話語；塞巴斯蒂安·馬拉比（Sebastian Mallaby）說：這個全球性帝國的產生"並不直接等於帝國主義的復活，卻可以彌補帝國時代以後遺留下來的安全漏洞，就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奧托曼帝國結束時實施的國際聯盟委任託管體制。"[65]第二種則是以歐洲聯盟為模型的、力圖抗拒全球性帝國的單極支配的區域性帝國話語。英國首相布萊爾的外交政策顧問羅伯特·庫伯（Robert Cooper）將這一帝國構想稱之為"合作性帝國"。在他的分類中，"後現代國家"的兩個典型類型是作為"合作帝國"的歐盟和作為"自願的全球經濟帝國主義"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這兩個組織都由一整套法律和法規協調運作，而不像傳統帝國那樣依賴於一個中心化的權力。庫柏的"合作帝國"構想以及"鄰國帝國主義"（the imperialism of neighbours）概念是在巴爾幹戰爭和阿富汗戰爭的陰影中提出的，它把"人道主義干預"的概念與一種新型帝國主義的概念結合起來，從而使得"人道主義"合乎邏輯地成為"帝國"的理論前提。歐盟是這一新型帝國的典範。 [66]

在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戰爭的背景條件下，亞洲知識分子在一種東方/西方或東洋/西洋的二元論中解釋歷史，從而近代亞洲論帶有強烈的文化主義色彩，不可避免地趨向於從一種文化同質性的角度去理解和建構"亞洲"或"東洋"的認同。然而，以這種方式形成的亞洲論述不但在實踐上難以令人信服，而且即使能夠成立，我們真的願意建立一種庫柏說的那種可以在人道主義名義下實行干預的"合作帝國"及其"鄰國帝國主義"嗎？在政治、經濟和文化如此復雜多樣的亞洲社會如何形成一種"連帶機制"，進而提供一種既不同於近代民族主義的國家模型，又不同於上述兩種"帝國"模型的區域關係？在經歷了極為殘酷的殖民主義歷史和波瀾壯闊的民族解放運動之後，我們能否探索出一種能夠避免帝國主義模式的既非國家式的又非帝國式的彈性機制？

讓我們從對不同的"東亞世界"歷史敘述出發展開思考。把"東亞世界"建構為一個相對自足的"文化圈"是近代日本思想的創造，但如何勾畫這一"東亞世界"卻存在著不同的方式。西嶋定生將"東亞世界"描述為一個自我完成的文化圈：從地理上說，"東亞世界"以中國為中心，包括其周邊的朝鮮、日本、越南以及蒙古高原與西藏高原中間的河西走廊地區東部諸地域；從文化上說，構成這個"東亞世界"特

徵的因素包括：漢字文化、儒教、律令制、佛教等四項。 [67]將地域與文化相互結合的目的是構築東亞的有機整體性，但這個"亞洲有機論"又是如何產生的呢？在前田直典看來，日本學者的傳統看法並沒有把日本包括在東亞世界內部：

一般以為，在近代之前，世界各地的歷史尚未有共同性時，中國是一個世界，印度又是一個世界。從文化史的角度來看，中國的世界可以視為一個包括滿洲、朝鮮、安南等在內的東亞世界，這也是過去大家的看法。把日本放進這個世界中雖然多少有些猶疑，但我們亦曾考慮過這個可能性。不過，這只是文化史上的問題。究竟朝鮮、滿洲等社會的內部發展和中國有沒有關聯性抑或平行性，我們近乎一無所知，日本更不必說。在歐洲的世界中，例如我們知道英國社會的發達與歐洲大陸有平行性，彼此相關。但在東亞方面，特別在日本和中國之間，是否有類似情況，除近代史的領域外，至今不僅仍未解釋清楚，甚至可以說近乎未成為問題。一向的想法是，日本從古代至中世、近世的發展，在社會基礎構造上與大陸全然隔離。 [68]

這種將日本從亞洲範疇中疏離出去的做法密切地聯繫著日本開港前獨特的歷史處境，以及此後產生的日本特殊論。聯繫與區別、脫亞與入亞，構成了近代日本的民族主義知識中的既相矛盾又相配合的亞洲論述的悖論式的特徵。

構築"東亞世界"的有機性或自足性的最為深遠的動力始終來自民族主義的、工業主義的和資本主義的"西方"。作為近代亞洲民族主義知識的一個有機的部分，人們渴望在"東亞文明圈"的表述背後看到的並不僅僅是文化的特殊性，而且是與這一文化特殊性相互匹配的民族主義的、工業主義的和資本主義的"內在的"和"普遍的"動力。因此，在東亞尋找現代性的努力一方面打破了黑格爾主義的"世界歷史"的秩序，另一方面又重構了黑格爾主義的"世界秩序"的內在標準：民族主義、資本主義（工業、貿易等等）和國家學說構成了"東亞"歷史敘述的"元歷史"(meta-history)。京都學派的代表人物宮崎市定對"東洋"概念做出了新的界定：一方面，他不再像傳統學者那樣把"東亞世界"視為"中國世界"的一部分，而是將中國及其歷史放置於"東洋史"的範疇內部；另一方面，他通過分析隋唐五代時期交通和貿易的變化，斷言"宋代社會可以看到顯著的資本主義傾向，呈現了與中世社會的明顯差異"，從而形成了一套與西洋現代性相平行的東洋現代性敘事。 [69]宮崎市定通過"交通"把不同區域的歷史連接在一起，並從這一視野出發闡釋"宋代資本主義"、"東洋的近世"以及"國民主義"（民族主義）。在《東洋近世的國民主義》一節中，他分析了秦漢、隋唐直至宋元明清時代的民族關係，認為北宋和南宋時期的中原與南北區域不僅出現了"國民主義的躍動"和超越朝貢關係的民族關係

（如遼宋之間的戰爭與"兩國之間的和平國交"，宋金戰爭），而且也出現了諸如大越國（安南）、大理國（撣族）等"名目上是中國的朝貢國"、事實上卻"獨立不羈的民族國家"--儘管這一過程為元代所終止，卻在其後激發了明代的"以漢人為中心的國民主義"。在這個意義上，亞洲民族主義的發展與西洋史是相平行的。[70]宮崎市定大膽地使用了各種歐洲範疇，他對唐宋之際、特別是對宋代的觀察是在"資本主義"和民族-國家的視野中組織起來的。這一為東亞尋找自身歷史的努力不可避免地帶有目的論的特徵。我們可以從這一"東洋的近世"與民族-國家論述的內在聯繫中看到歐洲的亞洲論述所包含的"帝國-國家"的二元論。 [71]

從這個角度看，浜下武志關於亞洲朝貢體系的研究既是對"脫亞論"的批判，也是對特殊論的反駁。他在經濟史領域重新建立了一個以朝貢體系為紐帶、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世界體系，並以此確認了亞洲內部--包括日本與中國之間--的"連帶關係"。儘管浜下武志同樣重視東亞的內部的現代動力，但與宮崎市定勾勒的歐洲式的"國民主義"（即民族主義）的"東洋的近世"完全不同，他以朝貢體系為網絡構築了亞洲的內在整體性。 [72]在浜下武志及其代表的學派提供了三個主要的前提：第一，亞洲不僅在文化上而且在經濟和政治關係上構成了一個整體；第二，這個整體是以中華文明為中心的、以超國家的朝貢網絡為紐帶的；第三，與這一朝貢網絡相匹配的是與歐洲"國家"關係不同的"中心-周邊"及其相應的"朝貢-冊封"關係。如果說宮崎市定的"東洋的近世"以"國民主義"為中心，那麼，浜下武志的敘述卻挑戰了這種"國家"與現代性之間的必然聯繫，進而以朝貢網絡為紐帶，構築了一種有關世界和區域歷史的另類敘事。在他看來，亞洲地區的朝貢網絡沒有被西方資本主義的近代擴張徹底擊毀，"作為一個世界體系的亞洲"即使在近代也仍然存在。浜下武志的論述是富於啟發性的，他不但發現了連接亞洲世界的一條內在紐帶，並以此為線索勾勒當代世界的圖景，而且也從周邊的視野揭示了中國正史中的大陸中心論和王朝正統主義。對於那些拒絕承認日本與亞洲的歷史聯繫的特殊論者來說，這是一個有力的批評；對於習慣於從中國內部視野來看待中國的中國學者來說，這一論述提供了一個從周邊觀察中國的歷史視野；對於總是以帝國-國家、朝貢-貿易的二元論的學者來說，這一以朝貢網絡（帝國體系）為中心尋找東亞現代性的努力構成了對於歐洲中心論的顛覆。

東亞整體性這一"事實"是以"東亞"這一範疇為前提建立起來的預設或建構，而浜下的論述側重於朝貢關係中的貿易方面，尤其是與東亞內部關係相互重疊的海洋貿易關係。我在這裡試圖以浜下武志的論述為基礎展開論述，並對他的論述進行補充、平衡和擴展。首先，"朝貢體系"不是一個自足的和完整的結構，而是由參與這一朝貢歷史實踐的主體之間的互動關係的產物，從而是一個不斷流動的、多

元權力中心相互生成的過程，任何一種新的力量參與到這一實踐之中都會改變其內部的權力關係。濱下武志將朝貢關係中的宗屬關係區分為六種類型（1，土司、土官的朝貢；2，羈縻關係下的朝貢；3，關係最近的朝貢國；4，兩重關係的朝貢國；5，位於外緣部位的朝貢國；6，可以看成是朝貢國，實際上卻屬於互市國之一類等），[73]但這一完備的敘述過於依賴於穩定的"中心-周邊"的框架和結構分類，難以完整地揭示朝貢實踐的不斷變化的歷史內含。宮崎市定曾從經濟史的觀點對中國歷史作出如下區分：古代至中世是內陸地區中心的時代，宋至近世轉變為運河地帶中心的時代，晚清以降則是海岸中心的時代，而後者顯然是在歐洲影響下發生的新事態。[74]如果中國內部的中心-邊緣關係是不斷滑動的關係，那麼，朝貢體系同樣如此，例如，宋朝在戰爭條件下與北方民族形成的朝貢關係完全不能按照濱下的公式描述為"中心-周邊"的關係，清朝與俄羅斯自 17 世紀以降形成的朝貢關係也不能被描述為"中心-周邊"關係。

現代資本主義世界的重要特點之一就是"中心-邊緣"關係的不斷滑動。如果將以中國為中心的"中心-周邊"構架作為解釋 19 世紀以降發生在亞洲內部的權力關係的前提就更難令人信服。正如濱下武志在他稍早時期的論文《資本主義殖民地體制的形成與亞洲——十九世紀五十年代英國銀行資本對華滲入的過程》中指出的那樣，資本主義列強向亞洲特別是向中國金融滲透的深化，是與美國、澳大利亞的黃金發現所導致的國際金融市場的擴大過程密切相關的。從金融的角度觀察，中國近代經濟史可以被看作中國經濟被編織在以倫敦為中心的整個世界一元化國際結算構造之中的過程。在這個意義上，亞洲的"近代"是在經濟上逐漸被包容進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近代歷史的過程，其特徵就是金融性統治—從屬的關係。[75]如果將"周邊-中心"的框架延伸到 19、20 世紀，並用以描述亞洲內部的權力關係，勢必掩蓋某些傳統的"周邊"範疇在新的世界體系中所居於的實際的中心地位。例如，如果把日本的"脫亞"和近代化（包括對台灣的第一次入侵和甲午戰爭）放置在"擺脫朝貢國地位"的框架（亦即"中心-周邊"框架）中解釋，不可能說明鴉片戰爭以降這個"中心-周邊"關係實際上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中心-周邊"、中華帝國-朝貢國（日本）的二元論實際上複製了歐洲近代思想中的"帝國-國家二元論"--如同丸山真男的描述一樣，歐洲"國家理性"一方面是在與神聖羅馬帝國、羅馬教皇那種超國家的上級權威對抗，另一方面是在與封建領主、自治城市、地方教會等中世紀的社會勢力的自理權要求相對抗中形成的。"[76]"中心-周邊"框架無法描述日本在近代亞洲扮演的歷史角色，無法解釋為什麼恰恰是"周邊"（日本、韓國、香港、台灣、新加坡等）先後成為 19、20 世紀的亞洲資本主義的中心或亞中心區域，而中國大陸、印度和中亞等傳統的"中心區域"卻長期淪為"邊緣"或殖民地。

浜下武志的創造性的研究也為一種以網絡而不是國家為中心的區域研究提供了可能，但也正是在這個網絡視野的擴展中，那種過於穩定的朝貢貿易或中心-邊緣架構本身也面臨了新的挑戰。正如浜下本人注意到的，在 19 世紀初期，中國的海外私人貿易網絡成功地將官方的朝貢體系轉化為私人貿易體系，這是長期歷史互動的結果。許寶強在他的博士論文中說，"當歐洲人在 16 世紀初來到東亞的時候曾試圖與官方的朝貢體系聯繫起來促進貿易的發展，但他們發現他們日漸依賴於廣大的中國海外貿易網絡，因而有意識地鼓勵這種網絡的發展。特別是在 19 世紀初期以降，以中國為中心的官方朝貢體系僅僅是一個從未真正實現的有關控制的官方幻想，因為中國面對著帝國主義列強的不斷增長的霸權和侵略。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官方朝貢體系，而是私人的中國海外貿易網絡把東亞地區整合到內在相關的歷史體系之中。"[77]按照他的論述，不是朝貢貿易，而是私人海外貿易（包括走私活動），構築了連接東亞和東南亞的貿易網絡的更為重要的紐帶。在 19 世紀歐洲殖民主義的條件下，東南亞的市場發展與其說是朝貢貿易的結果，毋寧說是打破朝貢體制的結果，走私、武裝販運和歐洲國家的貿易壟斷構成了 18-19 世紀東南亞貿易形式的重要特點。[78]在這裡，網絡的歷史演變也正是"中心-邊緣"的權力關係發生變異的產物。

其次，在由朝貢網絡結構起來的"海洋東亞"的圖景中，亞洲內陸的歷史聯繫及其變化明顯地被置於從屬的和邊緣的地位。如果我們把西嶋定生對於"東亞世界"的描述與這一以朝貢網絡結構而成的東亞世界做一個比較的話，後者的範圍主要集中在歐亞大陸東部地域沿海、半島及島嶼，包括東北亞與東南亞，大致與當代日本學術界關注的"海洋亞洲"的範疇相吻合。浜下是在與歐洲中心的對抗之中形成自己的亞洲論述的，他的描述集中在貿易、白銀流通等方面，描述的重心是中國與東亞和東南亞的歷史聯繫，亦即主要通過海洋聯繫形成的貿易交往，從而這一敘述與歐洲資本主義論述中的經濟主義邏輯和海洋理論框架有著呼應關係。在他後來的論述中，海洋理論作為一種近代性的理論越來越居於觀察亞洲問題的中心地位，因為這一理論處理的是一種與近代條約體系完全一致的政治經濟關係。儘管浜下以朝貢體系作為結構性的框架，但他明確地指出這一世界體系的基本規則必須修改，其基本的方向是建立以海洋為中心的、不同於西方貿易體系的新東亞體系。日本作為最早以平等貿易的條約體制向朝貢貿易體系挑戰的海洋國家居於時代賦予的特殊地位。也正由於此，這一"具有自己的內在整體性的歷史世界"以東亞和東南亞為中心，突出了文化、距離、海洋、政治結構在形成區域關係、尤其是貿易關係時的重要性；但這一整體性的亞洲觀對於在朝貢體系中長期居於支配地位的大陸關係（中原與中亞、西亞、南亞和俄羅斯的關係）缺乏深入的描述，

對於海洋貿易圈的形成與大陸內部的動力的關係涉及甚少，對於早已滲透在亞洲內部的"西方"的顯著存在未能提供更為清晰的勾勒。事實上，所謂"海洋時代"形成於歐洲工業革命、海洋軍事技術的長足發展和歐洲民族-國家體系的形成的條件之下，通過殖民主義和不平等貿易，"海洋時代"貶低大陸的歷史聯繫和社會關係，使之從屬於海洋霸權和由海洋通道連接的經濟關係。

從中國歷史的視野來看，西北、東北和中原的關係是中國社會體制、人口結構和生產方式發生變化的更為根本的動力，即使在所謂"海洋時代"，內陸關係也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中，陳寅恪對隋唐制度的論述及於（北）魏、（北）齊，梁、陳和（西）魏、周等三大淵源，並指出隋唐"文物制度流傳廣播，北逾大漠，南暨交趾，東至日本，西極中亞，而迄鮮通論其淵源流變之專書，則吾國史學之缺憾也"。 [79]他的《唐代政治史述論稿》、《論唐代之藩將與府兵》等研究論述了隋唐以來的中國制度、人口和文化已經是歐亞大陸的多重文化淵源和制度淵源的產物。拉鐵摩爾在《中國的邊疆》一書中曾以長城為"中心"描述出一個超越政治和民族疆域的"亞洲大陸"，為我們理解歷史中的中心與邊緣關係提供了極為不同的視野。按照他的"中心"概念，游牧和農耕兩大社會實體在長城沿線形成了持久的互動和相互影響，並將這種影響反射或滲透到各自的社會生活方式之中。 [80]這個作為"互為邊疆"的"長城中心說"糾正了中國歷史敘事中的那種以農耕為中心的片面敘述，進而與黃河中心的中國敘述，以及宋代以後的運河-江南中心的中國敘述形成了鮮明對照。歷史敘述的中心轉移除了與各時代的中心地位的移動有關，而且也還與觀察歷史變化的視野、尤其是觀察歷史變化的動力的視野相關。在拉鐵摩爾的視野中，只是在歐洲殖民主義和工業化的壓力之下，中國歷史內部的由北向南的運動路線才轉向由南向北的運動路線，以致他用"前西方"與"後西方"的概念來描述亞洲大陸內部關係的轉化。

在討論亞洲大陸的內部運動時，"前西方"與"後西方"的區分也是過於簡化的。隨著滿洲入主中原，中原地區的人口、經濟、貿易和其他文化關係的大規模北遷即構成了重要的現象。在 17、18 世紀，這一由南往北的運動主要來源於清朝帝國內部的運動，而與西方沒有多大的關係。 1857 年，馬克思在討論中國對海洋霸權國家的態度時觀察到一個現象，即當西方國家用武力來擴展對華貿易的時候，俄國沒有花費多少就獲得了比任何一個參戰國更多的好處，原因是俄國沒有同中國進行海上貿易，卻獨享以恰克圖為中心的內陸貿易，僅 1852 年買賣貨物的總價值就達到了一千五百萬美元，由於貨物價格低廉，這一總價值所代表的實物貿易量是極為可觀的。由於這種內陸貿易的增長，恰克圖從一個普通要塞和集市地點發展成為一個相當大的城市和邊區首府，並與九百英里之外的北京建立了直接

的、定期的郵政交通。[81]馬克思在《中國和英國的條約》和《新的對華戰爭》、恩格斯在《俄國在遠東的成功》等文中，不止一次提到中英、中法在沿海的衝突如何為俄國在內陸獲得黑龍江流域的大塊土地和利益創造了條件，預言俄國作為亞洲頭等強國的崛起將"在這個大陸上壓倒英國"，[82]批評英國媒體和內閣會議在公佈中英條約內容時掩蓋俄國在中國、阿富汗和中亞其他地區取得的更大的利益。如果我們把 1905 年日俄戰爭對日本現代化進程的影響、20 世紀中國與蘇聯的結盟與破裂放置在大陸與海洋關係的辯證法之中加以理解，那麼，歐亞大陸的互動對於東亞地區的近代影響顯然是極其巨大的歷史存在。

以朝貢體系為中心的亞洲論集中在"經濟關係方面"（尤其是以海洋為紐帶的貿易網絡），對於戰爭、革命和其他事件並未做出相應分析。孫文曾將華僑視為"中國革命之母"，從一個側面說明了海外網絡（尤其日本、東南亞各國）對於近代中國革命的影響，而這個海外網絡與朝貢路線之間存在著重疊性的關係。在戊戌變法失敗之後，日本不僅成為流亡的改革者和第一代中國革命者往返逗留之地，而且也成為中國近代啟蒙知識分子的搖籃；正是在這個時代，一批日本知識分子成為中國革命和改革運動的直接參與者；越南、馬來亞、菲律賓、緬甸等東南亞國家以及檀香山等地的華人華僑及其社團不但為中國的改良和革命提供了物質資源，也為這個地區的民族主義思潮注入了特殊的活力，從而形成了一個跨越國家邊界的社會運動網絡。隨著辛亥革命的爆發，這個以海外周邊地區為基地的革命運動在中國大陸紮下了根，進而為此後獲得發展的政治革命、土地革命和軍事鬥爭提供了最初的動力。這是沿海周邊網絡與內陸地區的互動在革命過程中的顯現。

與此相應，大陸與海洋的聯繫與區別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亞洲戰爭的特點。在《游擊隊理論--"政治的概念"附識（1963）》中，卡爾·施密特將"非正規地作戰"的"游擊隊"置於政治思考的中心，進而將"游擊隊"視為與"國家以及軍隊的這種正規性質"相區別的"非正規力量"。"以往歐洲國際法的古典戰爭法中，根本沒有現代意義上的游擊隊的位置。游擊隊要么是一支輕裝備、特別機動靈活、但屬正規的不對，要么乾脆作為可惡的罪犯被排除在法之外。""游擊隊員不僅與海盜、也與科薩爾(Korsar)根本不可同日而語，正如陸地與海洋作為人類勞動和各民族間武力衝突的不同自然空間不可同日而語。陸地與海洋不僅發展出不同的作戰手段和不同類型的戰場，也形成了不同的戰爭，敵人和俘獲的概念。只要我們地球上還可能存在著反殖民主義戰爭，游擊隊員就仍將是以陸戰為特點的積極鬥士。通過比較典型的海洋法形象和對空間方面的討論，游擊隊員依託鄉土的品格會更加鮮明。"[83]鴉片戰爭以降，中國面臨的外來壓力從內陸轉向了沿海，傳統的戰爭形式由此發生了變化。在 1894 年的中日甲午戰爭中，日本海軍徹底摧毀了清朝

的北洋海軍，控制了東亞地區的製海權；但從 1931 年入侵中國東北、1937 年華北戰爭爆發至中國的全面抗戰形成，強大的日本軍隊卻無法征服貧窮的和軍事上落後的中國。戰爭結果當然與復雜的政治、經濟、軍事和國際關係的諸條件有著密切的關係，很難從單一的角度加以分析；但日本在正面戰場上取得的軍事勝利卻無法保障戰爭的最終勝利是和這一戰爭的特殊形態相關的：這個特殊形態就是正規作戰與游擊戰、國家間戰爭與"人民戰爭"相互交織。與正規軍隊作戰相互配合的是具有靈活性、非正規性和依托土地的品格的游擊戰爭，後者與人民的普遍動員、高度的政治自覺的形成和清晰的敵我關係的界定密切地聯繫在一起。

在這個族群複雜、地域廣闊、以農民為主要人口的內陸地區，中國革命者將戰爭動員與革命動員綜合起來，以獨特的戰爭形式打破了歐洲國際法所確定的正規戰爭（國家間戰爭）概念，並為戰後中國內部的政治和軍事形勢奠定了完全不同於戰前的基礎。中國革命是在中國內陸的山脈、河流、叢林、平原之上展開的，通過土地革命的深入，現代中國的政治力量--尤其是中國的革命政黨--將幾代農民和他們的後代轉化為革命和戰爭的主體，從而創造了"人民戰爭"的新格局。通過戰爭的洗禮和革命的動員，那個在歐洲視野中始終是落後、保守之象徵的農業社會終於能夠轉化為能動的政治力量--革命建國、工業計劃、城市發展和新型城鄉關係的塑造均與這一新的政治主體的出現有著密切的關係。站在這個角度上重新理解毛澤東關於抗日戰爭時期游擊戰爭的戰略和戰術的討論，關於持久戰和中國農民和農村在戰爭中的角色問題的理論，以及他的新民主主義論，也許能夠獲得對於中國革命和戰爭的新理解。

從上述各個角度看，如何理解亞洲大陸與海洋時代的關係，如何理解亞洲的內在整體性與亞洲地區的文化多樣性和歷史聯繫的多樣性，仍然是一個有待進一步研究的課題。單純的海洋論視野無法解釋當代中國正在發生的沿海地區與內地（尤其是西北）的深刻分化，以及沿海經濟對於內陸經濟的支配性，也無法解釋以土地革命為中心的現代中國革命（以及俄國革命）的動力，以及二十世紀中日戰爭的特殊形態。更為重要的是：朝貢關係不是單純的經濟關係，它包含了不同文化和信仰的社會群體之間的禮儀和政治關係；在漫長的歷史演變中，由朝貢、貿易和移民造成的網絡還為革命、戰爭和其他社會交往提供了各種要素。在這個意義上，進一步闡釋朝貢關係的多重內涵，並從這一多重性中發現其與現代資本主義相互重疊或相互衝突的部分，構成了一個值得進一步探索的課題。

第三，朝貢體系的論述是在與歐洲民族-國家及其條約體系的對比關係中建立起來的，它所克服的是早期論述中那種以民族-國家作為近代性動力的唯一條件的

看法。然而，朝貢體系與條約體系的二元論仍然是一種帝國-國家二元論的衍生形式。早在 17 世紀，清朝國家就已經以條約的形式在某些區域（如清俄邊境）劃定明確的邊界、常設巡邊軍隊、設定關稅和貿易機制、對行政管轄範圍內的居民行使主權，並與歐洲國家建立朝貢/條約關係，而在現代社會理論中，所有這些要素都被視為民族-國家的特點。在這個意義上，清朝既是一個民族狀況復雜的帝國，也是一個國家製度極為發達的政治實體，它的發達的朝貢網絡同時也包含了條約關係。如果將國家與帝國、條約與朝貢放置在簡單的對立關係中來理解清代社會，就會忽略這一歷史中帝國建設與國家建設相互重疊的過程，從而也無法理解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基本特點。正是由於朝貢體系與國家體系具有某種複合關係，從而朝貢關係並不能單純地被描述為一種等級化的中心/邊緣關係。[84] 在這裡，真正關鍵的問題不是承認還是否認東亞或中國是國家中心的還是朝貢體系的，而在於重新澄清不同的政治體的概念、不同的政治體的類型、不同的國家概念，而不至讓國家概念完全被近代歐洲資本主義和民族國家的歷史所籠罩。朝貢體系與網絡類型的研究主要以經濟和貿易為中心，它所致力的一種另類的資本主義形態的研究，但朝貢體制涉及禮儀、政治、文化、內外關係和經濟等等內容，體現了一種獨特的政治文化，這是不應被忽略的。

如果朝貢體系是一種與近代歐洲主權國家不同的國家類型及其政治文化的產物，那麼，我們就需要將問題放置在不同的國家類型、不同的朝貢性質的比較關係之中重新解釋朝貢與國家的關係問題。中國歷史中的朝貢關係與條約關係並不是截然對立的範疇，例如，當清朝與歐洲國家展開跨越邊界的貿易、政治和軍事關係時，朝貢關係本身也正是國家關係的一種形式。俄羅斯、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等國家與清朝的關係既被稱為朝貢關係，但也是實質上的外交關係或條約關係。浜下武志在劃分朝貢類型時曾經指出過最接近於後來所謂外交關係和對外貿易關係的"互市類型"，而在朝貢圈內部又有所謂朝貢-回賜的關係，這一關係或者是等價的，或者是回賜超過朝貢的價值，從而朝貢關係具有經濟貿易往來與禮儀往來的雙重性質。在這一情況下，禮儀形式上的不平等與實質上的對等關係、朝貢關係的禮儀性質和朝貢貿易的實質內容相互重疊。如果朝貢關係與國家關係的重疊構成了朝貢實踐的一個內在的特點，我們是否也應該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待歐洲國家的內外關係，即不是將條約體系視為一種結構性的形式，而是看作是各種力量和形式歷史地相互作用的產物？例如，我們可以追問：19 世紀英國與印度、北美之間的貿易關係是朝貢關係還是條約關係？20 世紀（尤其是冷戰時代和後冷戰時代）的美國（以及蘇聯）與那些分佈在亞洲、歐洲和非洲的"同盟國"或"戰略夥伴"之間是主權國家間關係還是朝貢關係？在鴉片戰爭時代，魏源即已認識到：中國與英國在貿易方面的主要差別不是朝貢體制與條約體制的差別，而是如

下事實：中國並不依賴朝貢物品來支撐自身的經濟，從而也沒有一種內在的動力將帝國的軍事和政治關係與對外貿易直接關聯起來，而英國本土的經濟廣泛地依賴它與北美、印度或其他殖民地地區的貿易關係和朝貢品，從而英國經濟內部存在著將國家體制與貿易關係直接連接起來的動力。如果說中國華商的海外貿易是一種"沒有帝國的貿易"的話，那麼，英國商人從事的則是一種有組織的、兵商結合的、在國家保護下的貿易。[85]西方列強為了逼迫中國簽訂不平等條約而不得不承認中國是一個形式平等的合法主體，從而將歐洲基督教國家間或所謂"文明國家間"的國際法的主權概念運用於歐洲之外。如果按照"朝貢-條約"的規範性（或形式平等的主權概念）構架解釋清朝與日本在朝鮮半島的衝突和甲午戰爭，勢必遮蓋 19 世紀發生在亞洲區域的權力關係的重大轉變，進而用一種普遍主義的"理性"為歐洲國際法的擴張主義提供掩飾。因此，在朝貢與條約、帝國與國家的二元論前提之上，通過反轉二者的關係來反擊上述歐洲中心論的觀點，很可能簡化了亞洲內部的歷史關係的複雜性。從這一視野出發，如何界定亞洲的"中心-周邊"機制與歐洲的"國家"機制之間的既重疊又區別的關係成為一個值得認真思考的問題。

亞洲的"近代"問題最終必須處理亞洲與歐洲殖民主義和近代資本主義的關係。早在上個世紀四十年代，宮崎市定就開始從廣泛的交通關係中探討"宋朝資本主義的產生"，並深信"宋代以後近世史的發展，現在已經到了以東洋近世史的發展去探討西洋近世史的時候。"[86]他的"東洋的近世"的論述與日本帝國主義的"大東亞思想"的重疊並沒有掩蓋這一論述中包含的洞見。在一種世界史的構架內，運河的開鑿、都市的遷徙、香料和茶葉等商品在連接歐亞貿易網絡上的功能、蒙古帝國擴張所帶動的歐亞藝術和文化的交流等不僅改變了中國和亞洲社會的內部關係，而且也將歐洲和亞洲從大陸和海洋兩個方向上內在地關聯起來。[87]如果構成"亞洲的近代"的那些政治、經濟和文化特徵從 10-11 世紀即已開始，那麼，這兩個世界的歷史發展究竟是平行的，還是相關聯的呢？弗蘭克(Andre Gunder Frank)回答說：亞洲和歐洲從 13 或 14 世紀以來就已經深刻地聯繫在一起，從而我們在理解現代的發生時，必須從一個具有內在關聯的世界體系的預設出發。[88]交通的意義不是將兩個世界僵硬地捆在一起，而是如兩個用皮帶連接在一起的齒輪，一邊轉動，另一邊也會同時轉動。因此，一個合乎邏輯的結論是：

如果只有歐洲的歷史，歐洲的工業革命不能發生。因為這不單是機械的問題，而是社會整體結構的問題。工業革命發生的背後，需要小資產階級的興隆，亦必須有從東洋貿易中得到的資本積累。要機器運轉，不能單靠動力，還必須有棉花作為原料，更需販賣製品的市場，而提供原料和市場的實際是東洋。沒有和東洋的

交通，工業革命大概不會發生罷。 [89]

宮崎市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國史的範疇內部，他對亞洲與歐洲的交往關係的論述是單薄的；弗蘭克的研究是經濟主義和貿易主義的，幾乎沒有對歐洲社會內部的歷史動力及其與資本主義的產生的關係作出令人信服的解說。在他們的海洋中心論的結構性敘述中，戰爭、突發事件和其他歷史因素也不得不退居次要地位。但這些敘述從不同的角度提供了重新敘述"世界歷史"的可能性。

在這一互動的歷史敘述中，"亞洲"觀念的有效性反而削弱了，因為它既不是一個自足的實體，也不是一組自足的關係；它既不是一個線性發展的世界歷史的起點，也不是一個線性發展的世界歷史的終點。毋寧說，這樣一個既非起點也非終點、既非自足的主體也非從屬的客體的"亞洲"構成了重構"世界歷史"的契機。如果需要修正"亞洲"觀念的錯誤的話，那麼，我們還必須重新檢討"歐洲"觀念。套用列寧的語言來說，先進的歐洲到底是從哪裡產生出來的呢？落後的亞洲又是怎樣的歷史關係的結果呢？社會內部的歷史關係是重要的，但在長久的歷史之中，不斷伸展的區域互動關係對於一個社會內部的轉變的作用又該如何估價呢？如果亞洲論述始終以一個自明的歐洲概念為背景，而不是深入到歐洲歷史發展內部重新理解歐洲概念得以建構的動力，那麼，亞洲論述就無法擺脫它的含混性。

結語：一個"世界歷史"問題：亞洲、帝國、民族國家

上述敘述與其說證明了亞洲的自主性，毋寧說證明了亞洲概念的曖昧性和矛盾性：這一概念是殖民主義的，也是反殖民主義；是保守的，也是革命的；是民族主義的，也是國際主義的；是歐洲的，也反過來塑造了歐洲的自我理解；是和民族-國家問題密切相關的，也是與帝國視野相互重疊的；是一個相對於歐洲的文明概念，也是一個建立在地緣政治關係中的地理範疇。我認為，在探討亞洲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自主性的過程中，必須正視這一概念的生成歷史中所包含的衍生性、曖昧性、矛盾性-它們是具體的歷史關係的產物，從而只有在具體的歷史關係之中才能得到超越或克服。

首先，亞洲概念的提出始終與"現代"問題或資本主義問題密切相關，而這一"現代"問題的核心是民族-國家與市場關係的發展。這一概念中的民族主義和超民族主義的張力是與資本主義市場對於國家和跨國關係的雙重依賴密切相關的。由於討論圍繞著民族-國家和資本主義等問題展開，從而亞洲社會的豐富的歷史關係、制度形式、風俗習慣、文化構成都被組織在有關"現代性"的敘述之中，那些與這

一"現代性"敘述缺乏聯繫的價值、制度和禮儀則被壓抑到邊緣的部分。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如何在挑戰歐洲中心主義的歷史敘述的同時，重新發掘那些被壓抑的歷史遺產--價值、制度、禮儀和經濟關係等等，構成了重新思考歐洲"世界歷史"的重要環節。

其次，迄今為止，民族-國家仍然是熱衷於促進亞洲內部的區域聯繫的主要動力，其主要表現如下：一，區域關係是國家關係的延伸：無論是馬來西亞極力推動的亞洲論壇，還是韓國努力促進的東亞網絡，以及東南亞聯盟、上海六國等區域性組織，都是以發展經濟交往或國家安全為軸心形成的國家關係。二，亞洲區域的主權建構過程始終沒有完成：朝鮮半島、台灣海峽的對峙局面，戰後日本的不完全性主權國家形式，都表明 19 世紀啟動的民族主義進程仍然是支配東亞地區權力關係的重要方面。三，由於新的亞洲論述以形成針對全球一體化過程所造成的單極支配和動蕩的保護性的和建設性的區域網絡為取向，國家問題仍然居於亞洲問題的中心地位。亞洲想像常常訴諸一種含混的亞洲認同，但是，如果我們追問這一構想的製度和規則的前提，那麼，民族-國家這一試圖被超越的政治結構就會突顯出來。因此，如何在當代條件下處理民族解放運動的遺產（尊重主權、平等互信等等）和區域的傳統關係，仍然是一個需要認真考慮的問題。

第三，與上述兩個問題密切相關，民族-國家在亞洲想像中的支配性產生於近代歐洲所創造的基於帝國與民族-國家相互對立的二元論。這一二元論的歷史含義是：民族-國家是唯一的現代政治形式和發展資本主義的首要前提。然而，這一二元論既簡化了被歸納在"帝國"範疇內的政治和經濟關係的多樣性，也簡化了各民族-國家內部關係的多樣性。現代東亞想像以國家間關係為主要基礎，很少涉及亞洲區域的複雜的民族、區域和被覆蓋在"帝國"範疇內的交往形式--如超國家的朝貢網絡、移民網絡等等。在民族-國家成為一種主導性的政治架構的條件下，亞洲傳統的各種交往、共存的經驗和製度形式是否能夠提供超越民族-國家體制所帶來的內外困境的可能性？

第四，亞洲作為一個範疇的總體性是在與歐洲的對比關係中建立起來的，它的內部包含了各種異質的文化、宗教和其他社會因素。從歷史傳統和現實的製度差異看，亞洲並不存在建立歐盟式的超級國家的條件。佛教、猶太教、基督教、印度教、伊斯蘭教、錫克教、道教、禪教和儒教等等全部起源於我們稱之為亞洲的這塊佔世界陸地五分之三、人口一半以上的大陸，任何以單一性的文化來概括亞洲的方式都難以自圓其說。儒教主義的亞洲觀甚至無法概括中國的文化構成，即使將亞洲概念收縮為東亞概念也無法迴避東亞內部的文化多元性問題。新的亞洲想

像必須把文化/政治的多元性與有關區域的政治/經濟構架關聯起來。文化的高度異質性並不表示亞洲內部無法形成一定的區域構架，它毋寧提醒我們：這樣的一種構架必須具有高度的靈活性和多樣性。因此，亞洲想像的兩個可能方向是：一，汲取亞洲內部文化共存的製度經驗，在民族-國家範圍內和在亞洲區域內部發展出能夠讓不同文化、宗教和民族平等相處的新型模式；二，以區域性的聯繫為紐帶，形成多層次的、開放性的社會組織和網絡，以協調經濟發展、化解利益衝突、弱化民族-國家體制的危險性。

第五，亞洲與歐洲、非洲和美洲之間的宗教、貿易、文化、軍事和政治關係有著長遠的、難以分割的歷史聯繫，以民族-國家的內外模式描述亞洲或者將亞洲設想為一個放大的民族-國家同樣是不適當的。亞洲概念從來就不是一種自我規定，而是這一區域與其他區域互動的結果；對歐洲中心主義的批判不是對於亞洲中心主義的確認，而是破除那種自我中心的、排他主義的和擴張主義的支配邏輯。在這個意義上，洞悉"新帝國"內部的混亂和多樣性，打破自明的歐洲概念，不僅是重構亞洲概念和歐洲概念的前提之一，而且也是突破"新帝國邏輯"的必由之路。

第六，如果說對於亞洲的文化潛力的挖掘是對西方中心主義的批判，那麼，亞洲概念的重構也是對於分割亞洲的殖民力量、干涉力量和支配力量的抗拒。亞洲想像所蘊含的共同感部分地來自殖民主義、冷戰時代和全球秩序中的共同的從屬地位，來自亞洲社會的民族自決運動、社會主義運動和解殖民運動。離開上述歷史條件和歷史運動也就無法理解亞洲的現代含義，無法理解當代亞洲的分裂狀態和戰爭危機的根源。人們把柏林牆的倒塌和蘇聯、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瓦解視為"冷戰"的結束，但在亞洲地區，"冷戰"的格局在很大程度上保存著，並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發展出新的衍生形式。然而，當代有關亞洲問題的討論不是由國家推動，就是由精英發起，亞洲地區的各種社會運動--工人運動、學生運動、農民運動、婦女運動，等等--對此漠不關心。這與 20 世紀洶湧澎湃的亞洲民族解放浪潮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如果說 20 世紀的民族解放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已經終結，那麼它們的碎片仍然應該是激發新的亞洲想像的重要源泉。

在文章的結尾，讓我再次重申前面已經表達過的意思：亞洲問題不僅是亞洲的問題，而且是"世界歷史"的問題。對"亞洲歷史"的再思考既是對 19 世紀歐洲"世界歷史"的重構，也是突破 21 世紀"新帝國"秩序及其邏輯的嘗試。

1998 年初稿於北京

1999 年修改於西雅圖

2006 年初春改定於東京

註釋：

[65] See Sebastian Mallaby, "Reluctant Imperialist",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02.

[66] Robert Cooper, "Why we still need empires", *The Observer*, Sunday April 7, 2002; "The new liberal imperialism", see *The Observer*, Sunday April 7, 2002.

[67] 西嶋定生：《東亞世界的形成》，《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二卷，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 89。

[68] 前田直典：《古代東亞的終結》，《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一），頁 135。

[69] 宮崎市定：《東洋的近世》，同上書，頁 168，170。

[70] 在同一個歷史脈絡中，清王朝的興起也被看作是滿人國民主義躍動的結果。見宮崎市定：《東洋的近世》，《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一卷，頁 211—213。宮崎的觀點在當代學者的研究中也有呼應，例如何偉亞（James Hevia）在西方帝國主義和殖民研究的影響之下，避免了現代性與傳統這一通常的劃分，轉而提倡把英國與大清帝國自 1793 年以來的衝突視為兩個擴張著的帝國之間的衝突，每一個帝國都有其自身的策略和關注，而且每一個都以迥然不同的方式建構著他們自己的主權。（何偉亞：《從朝貢體製到殖民研究》，《讀書》1998 年第 8 期，頁 65。）

[71] 按照這一邏輯，我們如何理解蒙元帝國在溝通歐亞大陸過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如何解釋對於現代中國的疆域、制度和人口作出了基本規定的滿清帝國與"現代"的關係？在這方面，他的解釋是缺乏說服力的。

[72] 濱下武志：《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朱蔭貴、歐陽菲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73] 濱下武志：《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頁 35-36。

[74] 宮崎市定：《東洋的近世》，《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一），頁 168，170。

[75] 濱下武志：《資本主義殖民地體制的形成與亞洲——十九世紀五十年代英國銀行資本對華滲入的過程》，《日本中青年學者論中國史·宋元明清卷》，北京：中華書局，1995，頁 612—650。

[76] 丸山真男：《關於〈近代日本思想史中的國家理性問題〉的追記》，《日本近代思想家福澤諭吉》，頁 160。

[77] 以上所引是許寶強的博士論文中的話，該書尚未出版。感謝許寶強先生寄賜他的手稿供我參考。

[78] 中國與東南亞地區之間的聯繫的這種非官方性質，特別是通過走私、貿易和遷徙而形成的東南亞華人群體及其與中國的特殊的聯繫方式，提供了晚清中國革命的海外基礎和當代中國與海外華人經濟的特殊的聯繫方式。換言之，中國與南

洋的這種非官方聯繫為近代中國革命提供了一種特殊的亞洲動力。

[79]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陳寅恪史學論文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下同），頁 515。

[80] Owen Lattimor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New York: America Geographical Society, 1940.

[81] 這是馬克思於 1857 年 3 月 18 日左右為《紐約每日論壇報》第 4981 號所寫的社論《俄國的對華貿易》中的內容，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頁 9-11。

[82] 這是恩格斯於 1858 年 11 月 18 日為《紐約每日論壇報》第 5484 號撰寫的社論《俄國在遠東的成功》中的句子，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頁 40。

[83] 卡爾·施密特：《政治的概念》，頁 352，356，364。

[84]例如，俄羅斯與清朝建立了朝貢關係，但在一定程度上，它們從未將自己放置在低於對方的等級性關係之中。如果它們之間存在朝貢關係的話，那麼，它們實際上互相視對方為朝貢國。朝貢的禮儀實踐本身是多重力量相互作用的產物，等級性的禮儀體系之中包含了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對等原則，以及在不同角度進行多重解釋的可能性。這在有關中亞與中國的關係的研究中已經有所涉及，相關論述可參閱 Fletcher, Joseph F., *Studies on Chinese and Islamic Inner Asia*, Aldershot, Hampshire: Variorum, 1995。

[85] Wang Gungwu, "Merchants without Empire". In James Tracy, ed., *The Rise of Merchant Empir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400-421.

[86]宮崎市定：《東洋的近世》，《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一卷，頁 240。

[87]宮崎市定：《東洋的近世》，同上，頁 163，166。

[88]弗蘭克指出：1400 年以降，歐洲資本主義在世界經濟和人口中逐漸興起，這一過程與 1800 年前後東方的衰落恰好一致。歐洲國家利用他們從美洲殖民地獲得的白銀買通了進入正在擴張中的亞洲市場的大門。對於歐洲來說，這個世界經濟中的亞洲市場的商業與製度機制是非常特殊而有效的。正是在亞洲進入衰敗期的時候，西方國家通過世界經濟中的進出口機製成為新興的工業經濟。在這個意義上，歐洲近代資本主義既是歐洲社會內部生產關係變動的結果，也是在與亞洲的關係中誕生的。 Frank, Andre Gunder, *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89]宮崎市定：《東洋的近代》，同上，頁 236—238。

本文轉自人文與社會網站，原載於《去政治化的政治》（汪暉著，2008 年三聯書

店出版)